

奉行儒家道德 解決經營問題

仁大開講

就好像西方的基督教，自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所經歷的世俗化過程；中國的儒家，隨着中國最後一個皇朝清朝（1644—1911年）的衰落，同樣面臨着巨大的挑戰。1905年，科舉考試最終被廢除了，切斷了儒家古典教育與中國官僚獎勵分配制度之間的歷史聯繫。到新文學運動時期（1915—1921年），儒家思想已經成為被批判的主要對象。它先前作為中國文化價值霸權來源的地位，在當時受到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潮流的接連挑戰。

在現今的中國內地、香港或台灣，儒家幾乎沒有以任何形式出現在主流的意識形態中。由於儒家早已失去了制度上的支持，它主要是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殘餘而存在。因此，今天很難找到堅定地奉行儒家價值觀的個人，尤其是在工具理性已佔主導地位的商业世界中。

儒家企業家已經成為一種迅速消失的社會類型。因此，特別是從事中國商業和經濟發展的研究人員應迫切地對儒家企業家進行研究。不過，這樣的研究主要關注點不是在這「化石」完全消失之前將之記錄下來，而是要更好地了解儒家企業家如何體驗道德和經營理性問題之間的張力，以及他們如何調和這些張力。

當前，中國儒家企業家的研究可分成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傾向於以描述性方式研究儒家對企業家實踐的一般影響，例如中國企業家如何建立聯盟和關係。並且，也趨向將某些現代商業實踐歸因於某些類型的傳統儒家影響。

第二個方向：傾向於將儒家智慧理想化為「聖賢企業家」



儒家的基本倫理原則構成不少商業實踐的基礎。資料圖片

或「儒家企業家」（通常專稱為儒商），並將之定義為「具有儒家道德價值觀的製造或商業公司的所有者」。並且，這些聖賢企業家是以儒家思想，自我省察和維持和諧關係，將社會和道德價值觀與商業獲利和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根據以上的定義，只有少數企業家可以真正達到最高的道德標準和完美水平。

研究中國儒家企業家的方向和方法是個必須討論的範疇，但隨着日漸消失的研究對象，這個課題該定位為歷史研究、還是當代商業或經濟研究，可能才是要面對的難題。

下期仁大開講將轉另一話題，由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理學系黃仲鳴博士與大家說明新聞與報道。



林昊輝博士（現為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副系主任及助理教授，和企業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有30多年管理、研究及高等教育的經驗。在上世紀90年代，他主要參與中國內地的生物科技項目投資，及國營企業管理人員的培訓。）

根據道德 審視民意

古道今談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

我們現在對於社會輿論特別是所謂的民意，總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究竟民意該如何看待？孔子對於民意善惡及取捨有簡截的準則，值得今天所有人參考。公眾人物具有很高或很低的民意支持度，都要仔細觀察，因此孔子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必察」的原因是這種大眾普遍支持和反對的現象有可能是失實不真的。

以民意取向來評定政治人物的方法是否恰當？子貢當年就受到類似問題的困擾而需向孔子請教。無論是「鄉人皆好之」或「鄉人皆惡之」，孔子俱認為未足以反映實情，此中原因，一方面是被評者有可能是沽名釣譽，博採虛聲之徒，這類人孔子是看得很準的，如因子張之問而區別「聞」與「達」，說「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見《論語·顏淵》）的偽善者，他們很會捉心理用手段，因而得到不少人的稱讚。這類性情品格的小人既不會

絕跡，則百姓被誤導而民意被歪曲的情況就無法避免。

另一方面，評價者本身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如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孔子說：「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就是從批評者的文化道德水平來審視民意的可靠性，這是刪汰失實民意的好辦法。

孔子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在人的德性品格有別，所作出的評價亦與之相應。如要最大程度反映事物的善惡性質，則人的德性便是最可靠的依憑。

善者的好惡持平而合乎道德要求，不善者反之而背離道德。善與不善的價值既不相容，則善者所好同時就為不善者所惡。故同一事行不論評價如何，端看善人是否認同而不善之人是否反對，以此決定事之可否，而不必計較數量的多寡，因為善惡屬於性質問題而不是數量問題。

今天的民意調查採用抽樣的問卷形式，從量化角度處理問題，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這類民意調查，作為參考則可，認真看待則大誤。

鄧立光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學院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

厚德載物 保護生態

燦爛的中國文明

「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原文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即大地以其廣厚承載萬物、包容萬物，有才能的人亦應效法，以深厚仁慈的態度來愛護萬物。自古以來，中國人就重視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容；歷朝歷代都會頒布有關生態環保的法令，制定保護自然的各種鄉約和戒律。

例如《秦律》就規定：春二月不准入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燒野草作肥料，不准採集剛發芽的植物或獵取幼獸、鳥卵和幼鳥。唐代《雜律》亦規定：「非時燒四野者笞五十，至山林失火者徒二年，延燒林木者流二千里。」刑罰遠較現今香港的法律還要嚴厲！道教的戒律中亦有規定：「不得驚嚇鳥獸」、「不得以火燒田野山林」等。

這種精神實際上自古人將內在的美德，轉化到對待天地萬物之中。我們既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修

身養性，亦要以同樣的精神對待身外之物。除了律例的規定，有很多古人的故事，例如三國時候，有一位精於醫術的人名叫董奉，他隱居廬山後，為人治病不取報酬。不過，他有一個特別的要求，就是經他治好的重病患者，要栽五株杏樹，病輕的，則栽一株。

許多年後，他治好了成千上萬的病人，種下的杏樹達到了十萬多株，鬱然成林。他還在杏林中設立倉庫，有人想買杏時，可將穀物放在倉中，然後去取相同價值的杏子。他每年把賣杏換來的糧食，全部用來賑救貧困的人和旅費不夠的遊客。後世每以「杏林春暖」稱譽他的崇高人品。

最近天氣寒冷，不時可以在社交媒體中見到有人提醒，遇到有流浪貓到停車場中停泊的車下取暖，不要驅趕牠們，開車前也要留意牠們是否在車下。還有更多人關心在寒冬下，長者和流落街頭上的人的生活情況。這種種溫柔的關心和提醒，正正是「厚德載物」的表現。

中國文化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院成立了二十年，旨在弘揚中國文化，加深香港市民與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

私利人所共求 君子取之有道

古經今品

殷海光在《人生的意義》中指出：「古時有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餓死首陽之山，義不食周粟』。這是認為生物需要不及道德價值之重要。尤其宋明理學家就是如此的。他們的想法高得很，但也空得很的。」殷氏在該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四層說」，四層由低至高為：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物文化層、價值層。

這個由低至高的排列，並不是說較低的便較不重要，該受輕視甚至受指責，而是說較低的較基本，要先求滿足，在低層的需要滿足後，一步一步地追求更高的層次，直至道德、價值、理想的實現為止，這才是合情合理的人生道路。與此相類，現代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的需要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個等級。由此觀之，追求私利實屬人之常情。

或許有人會認為儒家重義輕利這一套，不適用於現代商業社會。現代商業社會建基於市場經濟，各人在市場中，只要不犯法，盡可追求其個人利益。而正是在自由貿易的市場中，人人都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推動着國家與世界的經濟發展。人人自利，反而對大家都有利。儒家不講私利，是否不可行呢？

其實儒家並非全然不講私利，孔子直言富貴是人人喜好的，貧賤是人人厭惡的，脫貧致富的欲望很正常，是人人心中所想所願，孔子本人也不例外。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像孔子這樣高學識、高品德、高名望的人，為了財富，也甘願去做執鞭這種低賤的工作，可見孔子其實也是追求財富的。不過，孔子主張君子求財須取之有道，即使在困苦急迫之時，也不可純粹為了個人利益而放棄道德原則。這點其實與現代商業社會的價值觀並不矛盾。

近來不是愈來愈多人提倡企業道德與企業社會責任嗎？如何在「義」與「利」中取得平衡，是古今中外的社會都關注的問題，也是人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系主任）
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

中華經典名句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朱熹《朱子家訓》，總結了先賢的行事精髓。「以」，認為、以為。「善」，好的行為。「為」，做。「惡」，犯錯的事、壞事。全句的意思是：不要因為好事微不足道而無心去做，不要以為是小小的壞事就放膽去做。



釋義及應用由招祥麒校長、朱崇學老師、許志榮老師、謝向榮博士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羅澄波校長撰寫。

體悟與應用

這句話最早見於《三國志·蜀書》裴松之的注解，是劉備逝世前告誡兒子劉禪的話，原句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話目的是勸勉劉禪多為好事，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好事，因為小善積多了就是利天下的大善；不要做壞事，哪怕只是小小的壞事，因為小惡積多了就足以成為擾亂國家根本的大惡。

整句話的精髓在一個「積」字。「積」源於時間，日積月累而不知不察。做小小的好事，久而不見其功，故失去了為善的動機；做小小的壞事，久而不見其弊，故存着圖德俸的心理，鼓動不起改善的決心。故此，我們不要以為一件小小的好事微不足道就不去做。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好事就會多起來，人生也走對了方向，我們也因此建立了健全的人格。

我們也不要以為做一件小小的壞事無足輕重，覺得並不打緊。這個守住道義的缺口一旦打開，就如船隻的方向盤錯撥了一個刻度，航行的目的地將永遠無法到達，而整個人生的方向也扭轉了。許多犯錯累累的人，也不是由小錯慢慢累積成大惡嗎？